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76—1982

中篇小说集

上卷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76 — 1982

中篇小说集

上卷

江晓天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30590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5 · 北京



1030590

本分集主要编辑人员

主 编 江晓天

主编助理 王兴仁 刘蓓蓓

责任编辑 邢菁子

助理编辑 李金玉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76—1982〕

中篇小说集(上卷)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6开本 46.75 印张6 插页 1016千字

1985年5月北京第1版 198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

书号: 10355·163 定价:(精)10.75元(平)8.15元

出版说明

(一)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六十多年来，中国的新文艺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深刻地反映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它是本世纪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对于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编纂一部反映“五四”以来中国新文艺优秀成果及其发展历程的拔萃本总集，目的是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进一步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研究、总结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衍变的规律和历史经验，提供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资料。我们也期望这部总集，能帮助广大读者，在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选择精英，统览各个时期的优秀文艺作品，从中汲取教益；并能有助于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和研究中国的新文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二) 《中国新文艺大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纂的指导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精选、严选、拔萃与代表性相统一的标准，力求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反映我国新文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概貌。

(三) 《中国新文艺大系》按历史时期分辑，由近及远地编纂出版。从“五四”运动前后到一九八二年底，共分五辑：第一辑[1917—1927]；第二辑[1927—1937]；第三辑[1937—1949]；第四辑[1949—1966]；第五辑[1976—1982]。若干年后，将续编以后的各辑。

《中国新文艺大系》每辑按文学艺术的门类和体裁分集，各辑的分集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所有分集均有主编撰写的导言。入选作品的作者简介汇编于《史料集》。全书索引及必要的资料将另行编辑出版。

（四）这次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共二十三集。其理论部分包括文艺基础理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文学部分包括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散文、杂文、报告文学（包括通讯、特写）、儿童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部分包括戏剧（话剧、戏曲）、电影、电视、曲艺、音乐（声乐、器乐、歌剧）、美术、摄影、舞蹈、书法、杂技；此外，还有一集史料。

优秀的长篇小说本辑不列分集，其目录由《史料集》收选。香港、澳门、台湾作家的作品，因资料不全，难于精确选拔，暂不收录；俟条件具备，另行增补。作品编排一般以首次发表时间或所据版本的时间为序，少数分集分类后再按时间先后排列。注释一律采用原著，凡编者新增加的，均有说明。个别作品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少量的文字改动或由编者订正讹错。

（五）《中国新文艺大系》的编纂，是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中国新文艺大系总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依靠文艺界的大力支持、组织广泛的社会力量进行的。工作中我们还得到有关部门及海内外专家、读者的热情赞助；谨在此一并表示谢忱，并恳请惠予教正。

中国新文艺大系编辑部

一九八四年九月

导言

江 晓 天

人们常常用“崛起”来形容和比喻新时期的文学。我们在编选这卷中篇小说（1976—1982年）时，不禁联想到大自然神奇的“造山运动”诞生了那么多巍巍壮观的奇峰异景。而短短几年间，我国社会主义文学领地上，峰峦迭起，堪称辉煌壮丽，实为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亦可谓文学“造山运动”。

新时期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开创意义的文学现象，它的运动轨迹尚在发展过程之中。全面地、完整地总结它的全部历史经验为时尚早，也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这里，仅就中篇小说在新时期的崛起、新时期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作一点探讨和论析。不当之处，还望同志们批评教正。

一

我们将新时期以来中篇小说的迅猛发展称做“中篇小说的崛起”，这一方面是与它自身的过去比较，另一方面是与同期长短篇小说创作比较而言的，这样，中篇小说的成就就更为突出，更为引人注目。

事实正是如此。在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上，中篇小说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突飞猛进地发展过，繁荣过，昌盛过。就创作的作品数量说，有人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建国后的“十七年”出版中篇小说“约六、七百部之多”，动乱的“文革十年”期间出版中篇小说很少，而进入新时期以来的短短六、七年里刊发出版的中篇小说竟远远突破了五千大关；新时期以来中篇小说的增长速度是过去的二十多倍，在小说创作各门类乃至整个文学门类中居于领先地位。就创作质量来说，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曾经产生过较大社会影响的作品，如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孙犁的《铁木前传》、杜鹏程的

《在和平的日子里》、陆柱国的《风雪东线》、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管桦的《英俊地》、谢雪畴的《团指挥员》、古立高的《永远向着前面》、刘澍德的《桥》和陆俊超的《九级风暴》等，并不算多。“文革十年”中公开出版的中篇小说能够留存下来的几乎只有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此外，虽遭查禁，却仍在群众中流传的“手抄本”中篇小说倒有几部是写得不错的，如八万字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和《公开的情书》。而方兴未艾的新时期文学中的中篇小说创作则波推潮涌，浪花迭起，优秀作品可谓花团锦簇，珠联璧合，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致使在各种中篇小说评奖活动和中篇小说书刊编选中，优秀的中篇小说选目都只能部分地入选。如这次《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中篇小说集》除选入的《天云山传奇》等二十四部作品之外，还有不少较好的作品，但由于篇幅所限，为求题材风格多样等原因而未能入选。一九八三年及其以后问世的佳作，则因截止时间所限而不能入选。新时期以来的中篇小说创作，无论是它所反映的生活题材之广泛，包含的思想容量之深厚，描摹的人物形象之鲜活，驾驭的艺术手段之多样，还是它整体的思想艺术质量之高超与精湛，都远远超过了以前，都是前所未有的。

崛起的中篇小说！这是任何一个不带思想偏见和艺术偏见的读者、评论者和研究者都不能不承认的事实。

面对中篇小说创作群峰迭起的雄奇而又壮丽的艺术奇观，人们在惊愕和赞叹之余，不禁要问：中篇小说创作何以会在这么短短的几年里有如此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崛起呢？

群峰迭起的我国西南高原山区是整个地球内部运动——不断的“造山运动”——所推压而形成的结果。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造山运动”。这就是我国近几年来激剧而又深刻的社会变化给各条战线和各个领域带来的巨大推动力，它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各条战线和各个领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雄奇而又壮丽的景观出现了：社会生活的“地壳”如同涨满春潮的海面不断隆起、涌动、壁立一样，形成了一座座层峦迭嶂的高山。

中篇小说的崛起离不开整个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而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又离不开整个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和政治形势。这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历史新时期为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无限宽广的道

路,为开创新时期文学的新局面创造了最适宜、最清明的条件和环境。作为新时期文学突出部分的中篇小说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吸取了它的阳光雨露才结出如此硕大众多的果实的。如果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最初几年,人们还没有从“心有余悸”中解脱出来,创作思想还表现出旧的痕迹的话,那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好的中篇小说就如同“雨后春笋”了。这里入选的中篇小说佳作,毫无例外地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就是一个明证。难道不是这样吗?试问: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没有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实事求是精神的恢复,没有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篇小说创作中能够出现揭露“左”的错误扼杀正直无私的干部群众政治生命的《天云山传奇》、《土壤》和《远去的白帆》吗?能够出现披露建国以后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并对此进行反省的《蝴蝶》、《布礼》和《洗礼》吗?能够出现抨击“浮夸风”带给中国广大农民巨大灾难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吗?能够出现控诉“文化大革命”给广大知识分子带来精神扭曲和心灵创痛的《啊!》吗?不能,当然不能。同样,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历史新局面,没有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推行,没有从农村到城市的经济改革的现实生活,也不可能有反映经济改革和干部体制改革的《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祸起萧墙》、《龙种》和《无反馈快速跟踪》等等一系列闪耀着新的思想光芒的作品。新的时代思想和新的社会生活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准备了最根本、最深厚、最坚实的土壤和社会历史条件,同时也为新时期以来中篇小说的崛起和繁荣提供了最根本、最深厚、最坚实的思想、生活和艺术条件。

党中央领导下的“拨乱反正”,恢复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坚决地清除“左”的流毒和影响,制定了开创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给新时期文学开辟了无比广阔的道路。而新时期文学创作与新时期社会变革、历史发展紧密结合,与广大人民群众对历史、对现实的思考、愿望和要求同步前进,从而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势不可挡地得到了迅猛发展。这是新时期的主流,也是新时期文学空前繁荣发展的基本原因。

但是应当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这个历史新时期所带来的社会历

史条件并不是崛起的中篇小说所独具的，中篇如此，文学如此，其它的艺术形式也如此。新的历史时期所提供的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并非厚此薄彼而单单厚爱中篇小说，它所提供的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如同阳光、雨露、春风一样，也同样照耀、滋润和吹拂着新时期的一切文学艺术之花。那么何以中篇小说能够凌驾群芳而独成崛起之势呢？事物除了共性同因之外尚有个性异因，因此我们在这里除了一般地分析新时期文学繁荣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之外，还必须对近几年中篇小说崛起的特有原因或中篇小说自身的审美特性作进一步的研究。

在小说艺术中，现在人们有时还习惯用字数的多少来区别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这自然很方便，很简单，很易行，但并不是主要的、本质的。正确而深入的辨析应当建立在它们反映生活的深广程度、思想容量与艺术手段上。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虽然不能类比几何学中的点、线、面的关系，但它们在审美属性上和篇幅的长短上的差异却也是明显的。短篇小说因其写作灵便，能够迅速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但也因其形式短小，只能截取生活的片断，“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因此它所包含的生活容量也就不尽丰厚，故事也就不够完整。长篇小说较之短篇小说，其优长在于反映生活的深广程度和包容的思想内容要丰厚宏大得多，故事也较为完整，但又因其孕育和写作的时间漫长而不能迅速地提供给读者。中篇小说兼有二者之长，既能迅速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又能包容较广阔的生活内容和较深厚的思想内容。因此，这就为中篇小说的崛起和兴盛准备了重要的内在依据。从社会需求来说，生活在历史新时期的读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急切地需要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更多地了解社会生活，并从而要求对他们生活中所经历过、思考着的一些有关人生、社会方面的问题给以回答；他们还需要以比较集中和较少的时间与财力去获取比较丰厚和完整的文学教益与艺术营养，于是他们在小说形式中找到了中篇这个既轻便又厚重的理想品种。一个时代和时期社会上广大读者的阅读欣赏需要，对创作样式的变化和发展，必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虽然没有固定的形式和社会职能机构，在读者与作家间传递信息，但它却是不可忽视的带有规律性的一种客观存在。这可以说是中篇小说在近几年中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原因。

从作家的主观因素来说，一些比较活跃的中年作家积累了相当的生活素材，觉得短篇已经容纳不下自己的生活、思想和艺术积累，希望改换一种较大的文学容器来自由裕如地装载自己溢满情怀的生活、思想和艺术积累；或者不愿继续将自己完整的生活、思想和艺术素材写成分散的众多的短篇，而希望将本来有头有尾、有因有果的生活、思想和艺术材料，或经过周密而精巧的艺术构思，或稍加调整和完善，写成完整而有分量的中篇。这种迹象已在不少作家的创作轨迹中明确地显露出来。

中篇小说应运而起，除了上面说的主观因素（即中篇小说自身的审美属性和作家的生活、思想与艺术积累对文学容器变更的要求）和客观原因（即读者对中篇小说的社会需求所带来的机遇）之外，我们似乎还应当看到众多的大型文学刊物为中篇小说创作提供了适时的发表园地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和因素。没有众多的作家创作中篇小说固然不会产生大量优秀的中篇小说，而作家们写出大量优秀的中篇小说如果没有众多赖以发表的大型文学刊物也是不行的。有人说“丛刊丛生，中篇复兴”，此论虽没有道出中篇小说繁荣兴旺的根本的主要原因，但说明了它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众多的大型文学刊物为中篇小说争奇斗艳提供了土壤和园地，而中篇小说的大批产生又回过头来刺激并巩固了众多大型文学刊物的发展与进步。据悉，全国省市一级以上的大型文学期刊，“文化大革命”以前仅一种，“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一九七八年有一种，一九七九年为十三种，一九八〇年为二十六种，一九八一年及其以后则不下三十种。此外，越来越多的读者宁愿用同购买一部长篇小说、一本个人专集相当的钱，去买一期刊登两三个或更多的题材、风格都不同的中篇小说大型文学期刊，既可满足多样性的要求，又便于保存和流传。因此也可以说，大型文学刊物为中篇小说开辟了园地，而中篇小说的刊发又为大型文学刊物打开了文化市场和销路。

从整个新时期文学赖以繁荣和发展的政治情势与社会环境，到具体的小说艺术品种审美属性的差异，从作家对小说艺术品种的更替和选择，到广大读者对小说艺术品种的需求，从作家的写作心境到作品的发表园地，各个环节都为中篇小说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最优厚、最美妙、最适时的机遇。在时代、社会和人民的呼唤中，在作家自觉地认识、选择并把握了这一适应时代、社会和人民需要的艺术品种之后，中篇小说群峰迭起的局面就成为一个顺

理成章的历史必然了，于是一个文学史上的奇观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中篇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崛起！

此外，这里应该提及一点，在中篇小说崛起的冲击和推动下，长篇小说创作也出现了空前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忠实于生活，就要真实地描绘生活固有的面貌，这尤其需要直面人生的真诚和正视现实的勇气。在这里，我们忍不住要为军事题材文学特书一笔。中篇小说里反映部队生活的作品，以《高山下的花环》和《射天狼》等佳作为代表，摆脱了比其它题材受到的更多的束缚，在如何对待军队内部客观存在的实质上具有社会性的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梁三喜和靳开来的英雄壮举，绝不仅仅体现为他们倒在战场上的一刹那，更体现在他们背负着“四人帮”给我们的民族留下的贫困，承受着“左”的思潮和封建残余思想对正直的人的不公正的评价，明知自己不能为亲人留下哪怕一笔抚恤金，也不能为妻儿留下一枚勋章，却仍然义无反顾地赴汤蹈火为国捐躯。正是他们在这广大读者都会遇到的矛盾冲突中显示的悲壮的美，沉重地拨响了军内外每一个读者的心弦。军事题材文学能够以当代军人的形象、“直线加方块”的军营生活震动整个社会，重新赢得广大读者，是生活对忠于她的作者的最高奖赏。同样，《人生》中描绘的一个青年农民的悲剧，也因其包含的印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典型的矛盾冲突，在各阶层读者，特别在广大城乡青年心中掀起的巨大波澜，清晰地显示了中篇小说开掘、提炼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行业文学”向“社会化”提高的趋势，已在中篇小说创作上明显地展现出来了，致使当代文学史上传统的“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军事题材”、“青年题材”等等概念显得狭隘、含混，很难准确地规范、概括小说创作的实践，而需要重新探讨。这就标明革命现实主义作家对生活的总体感受，对生活的各个方面内部和外部复杂的辩证关系的艺术把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坚持对生活的忠诚，需要勇气和激情。这种勇气和激情，归根结底来自对人民母亲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责任感，对历史的使命感。人民的喜怒与哀乐，人民的情绪和要求，人民的理想及希望，总是要通过各种渠道，近些年来往往是通过文学的渠道，不可遏止地表达出来。始终和人民休戚与共的新时期文学光荣地履行了自己的这一天职。而中篇小说，如《天云山传奇》，率先突入到当时尚属禁区的、却是人民群众长期思考的对五十年代反右派斗争的估价问题，探究到了“十年动乱”的历史渊源；又如《人到中年》，第一个把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一样作为中国的脊梁加以描绘，大声疾呼抢救“四化”重任的承担者——中年知识分子，体现了时代的要求；

再如《祸起萧墙》，动人心魄地揭示了封建主义遗毒和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弊端，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格格不入，水火不容，写出了第一部新时期生活中的应该避免的悲剧……它们所包含的深广的、历史的、社会的内容和率直的思想尖锐性，在当时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中还是不多见的。几经波折，《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祸起萧墙》和《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遇到和自己的主人公相同阻力的中篇，终于在文坛上赢得了自己应有的位置，这是在党中央的巨大关怀下，作者、读者和评论者共同奋争的结果，是革命现实主义的巨大胜利。

仅仅是短短的几年，题材和主题有形或无形的禁区便被接二连三地冲破了。而关于应该“写什么”、“怎样写”的讨论一直都在无拘无束地进行着。有人主张文学要“同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人却主张文学要“与生活同步”，而更多的人则相信我们绝大多数作家是真心实意地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那么他们尽可以根据各自的生活和气质，去奉行“距离说”或“同步说”，但希望他们在不同题材和主题的作品里，都能渗透着时代的精神。于是理论界又对文学作品的“时代感”、“当代性”众说纷纭。在考察文学同生活的关系、文学的社会功能的时候，我们宁愿把问题理解得更宽泛一些。中篇创作丰富的实践经验已经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它自己的主题，自己的代表作。我们有很多作家都身不由己地受时代驱使，去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那些“应运而生”的《人到中年》、《祸起萧墙》、《高山下的花环》、《蝴蝶》和《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中篇，都直接描写了当前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矛盾，集中地、强烈地、鲜明地体现了时代精神，无疑地这应是我们着重提倡的；而没有直接写经济改革的《人生》，之所以能成为描绘农村现实生活的作品中的佼佼者，是因为我们从《人生》中感受到的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冲击，比某些肤浅地表现“责任制”、“万元户”的作品来得更扎实、更有力；至于《黑骏马》、《那五》和《驼峰上的爱》等作品，似乎距离当前的现实生活远些，但谁也不能否认这些作品对现代文明的肯定、对“八旗子弟”命运的思索、对人与人之间纯真感情的向往，却也表现出强烈的当代意识。从入选的作品不难看出：中篇创作为文学同生活的联系创造出了多种样式，最要紧的首先不是对作品表现的内容在时间和空间上做出统一的规定，而是力求准确地把握时代的本质特征和历

史发展的趋势。至于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宣扬陈旧的观念、推崇与时代发展背道而驰的美学理想的作品，自会有广大的群众和无情的时间去淘汰它们。丰富多采的题材和主题，必然会使各色各样的崭新的人物形象从四面八方涌向当代文学的画廊。革命文艺发展到今天，才真正做到了“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在这之前，我们见到过陆文婷吗？见到过“马列主义老太太”吗？见到过吴遥吗？见到过李铜钟吗？见到过盘老五吗？见到过张思远吗？见到过解净和刘思佳吗？见到过高加林、韦乃川和靳开来吗？还有傅连山、龙种、钟亦成、那五、赵蒙生……这众多的艺术形象不但使人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显示了中篇创作的繁荣，更因其典型化程度较高，而标志着中篇创作的水平。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欣喜地指出：知识分子形象系列在当代文学史上取得了破天荒的发展变化。在“十七年”里，以知识分子为正面主人公的作品，只有《青春之歌》、《小城春秋》等等屈指可数的几部；出现在作品里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是呆头呆脑、幼稚可笑、自私怯懦、脱离群众、右倾保守的“被改造”者，到了“文化大革命”，便发展成“臭老九”以至反对革命、叛国投敌的“专政对象”。随着极左思潮毒菌的清除，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历史使命把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容置疑地突现出来之后，知识分子形象才拭掉历史的尘垢，恢复了自己本来的面目。陆文婷便是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典型不一定代表多数，而陆文婷形象确实代表了我国知识分子的多数。他们的忠诚，他们的才华，他们的窘迫，他们的隐忍，他们的坚韧，他们的牺牲，都鲜明、集中地体现在陆文婷身上。当然，我们并不满足于一个陆文婷形象，我们希望那些带有鲜明的历史新时期特征的、具有强烈的新人气质的知识分子的成功形象，不仅出现在报告文学作品里，也应活跃在中篇文坛上。还有一个韦乃川，他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的人”的形象。他的“性格悲剧”，不仅会震动广大知识分子的心灵，也会给每一个不甘平庸而愿奋发有为者以警醒和启迪。

最基层的、最平凡的、真正“普通劳动者”的形象，也终于冲破了“中间人物论”和“根本任务论”的禁锢，散发着新鲜的气息站在广大读者的面前。他们本来是我们国家的主人翁，也理应是文学作品的主人公。盘老五（还有《如意》中的石义海等）形象登上文坛，表现了社会主义文学视野的

扩大，也反映了整个社会对普通群众的关心与尊重。盘老五形象使我们感受到我国最基本、最广大的群众的喜怒哀乐、追求向往和气质情操，在他们身上，积淀着更多的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的美德。我们赞赏盘老五形象，自然表示我们不能同意那种认为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美学价值必然大于其他形象的似曾相识的见解；但我们也不敢苟同“非英雄化”的主张，更不能欣赏有些作者崇尚的、并过分渲染的某些劳动者身上实际是很愚昧的“原始的野性”、“原始的美”。

小说家们对各色各样人物的把握，已达到了更为纯熟的程度。他们在塑造人物性格时，既不把正面人物“神化”，也不把反面人物“鬼化”，而是不断地克服简单化、单一化，努力刻画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体现了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格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形象。高加林形象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是一个成长中的当代青年的典型。他对现代文明的渴求，是进步的、合理的，但在他尚未对历史的必然要求取得清醒的认识时，他的欲望中就难免有个人主义的因素，而现实环境中理应被革除、却又暂时还强大的东西，又不时地压抑、扭曲着他的正当要求；当他对历史赋予的使命缺乏自觉时，他的进取精神里就难免掺有个人奋斗的劲头；他有吃苦耐劳的气魄，但抵御不了社会上“后门”、“捷径”的诱惑；他深知农民的全部艰辛和伟大，但又能忍心弃父老们的命运于不顾；他对待爱情的态度不能说不严肃，但最后还是扮演了“薄情郎”的角色……他的性格体现了人和环境的全部复杂关系，是作者对“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的艺术的把握。正如同现实生活中的高加林们遭遇的那样，高加林形象也成为读者、评论者争议的课题，这倒可以表明这一性格塑造得成功：人们再也无法异口同声地用“坏蛋”或“好人”一类字眼儿来回答幼儿园小朋友对高加林的询问了。而《立体交叉桥》中侯氏兄弟等人灵魂深处的伟大和渺小、高尚和庸俗、深刻和浅薄、自尊和自卑的搏斗，实在叫人感到触目惊心！即使对最富有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梁三喜、靳开来和赵蒙生等形象，作者也没有用单一的色调去描绘他们，而是向读者充分展示了任何一个可信、可亲的英雄都不可能没有的普通人的心理、气质、感情和弱点。我们推崇的这些性格，其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和谐地统一在一个有机的整体之中的，他们同那些为了“复杂”而任意拼凑互相矛盾的种种方面，使人看不到其发展逻辑，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分裂的性格之

间，是有着明显的高低、优劣之分的。

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是新时期文学塑造人物性格时重要的、也运用得相当成功的方法。有些作品已经干脆不再注意结构情节连贯的完整的事件和故事，而是努力描绘人物心理活动的过程。对人物精神世界的表现，已成为很多作品重要的内容。陆文婷几十年间走过的艰难的生活道路，是通过她昏迷中的幻觉展示的；在她的内心活动中，她对爱人、儿女和病人无穷的思恋与牵挂，使多少读者为之鼻酸落泪。而《蝴蝶》和《布礼》，更是这种尝试的成功的代表作。钟亦成和张思远的深邃的思想，汹涌的激情，自由的联想，奇特的幻想，梦境，幻觉，瞬间的感觉，都把我们引进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并同他们一起思索着国家、民族和党的历史，和他们一道，在自己的心和人民群众的心之间，架设一座坚固而又畅通无阻的桥梁。我们无庸重复很多评论家对这类作品的高度评价，我们只想不无感慨地说：想当初，这样的尝试还受到不少非议和责难。然而短短几年的时间已经表明：绝大多数作家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的，因而他们对心灵世界的探索，并不是躲进了感情世界的“小天地”，更不是钻进了唯心主义的“死胡同”。现在广大作家和读者已经接受了这种探索；当初以王蒙为首的几个北京作家因这种探索而被称为“折光派”，如今“折光派”已遍布全国各地了。这种探索，正是时代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不言而喻，人的精神生活，是人的生活的重要部分。作为“人学”的文学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当然要包括人的主观世界。而人的内心活动，恰是客观世界的折光，所以从探索人的心灵这一新颖的角度来反映客观世界，表现人，可以使革命现实主义更为广阔，更为完全，更为充分，更为深入，增强反映生活的能力。而且，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我们民族的内心世界已经从单纯、狂热、盲从和保守进入到复杂、冷静、多思和开创性的状态，忠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家，责无旁贷地要反映这种深沉的思索。于是，“心理小说”应运而生了。我们回顾这些，无非是要总结一点也许可以称之为“经验”的东西，即：对任何一种艺术上新的尝试，我们都应至少采取宽容的态度，客观分析的态度，切忌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坚信群众和时间会对它们做出鉴定取舍的。

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正是为适应描绘人物心灵世界的需要，一些作家才为我国当代文学引进了西方现代小说的某些技巧和方法，诸如“意识

流”的手法中某些可取的成分，等等。这是由于内容的变化引起的形式的变化，不是为了“掩饰作品内容上的缺陷”而“耍花招，玩花样”。于是，小说的传统写法的框框套套被打破了，中篇小说出现了新的式样、新的特点，获得了新的活力。比如，由于小说描写的主要对象是人的心理活动，而人的思想是可以自由驰骋的，所以象《蝴蝶》、《布礼》和《人到中年》等很多部中篇小说所容纳的生活的时间跨度之大、空间范围之广，都远远超过了用传统手法写出的长篇，为人物的心理、性格、命运揭示了广阔的历史背景，但其篇幅并没有拉长，也没有变成压缩的长篇。这是因为在心理活动中，现实与历史的转换，时空顺序的跳跃等等，都为这么大的容量构成了十分灵活的框架。又如在《土壤》中较早采用的那种多重叙述角度已在中篇创作中广泛地运用，作者调动了作品中每一个人物的“积极性”，让几个人物交叉地进行戏剧式的内心独白，既展开了情节，又使各主人公从各自的角度、各自的立场和观点观察体验了同一生活内容，描绘了自己和别人的形象，这就使作品中的生活和人物形象的立体感大大增强。而读过象《黑骏马》那样的小说的人都会感到，曾在当代文学史上显得势孤力单的抒情散文式的小说也迅速地发展了。

我们所肯定的，是对西方现代小说一些手法和技巧的借鉴，而不是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哲学观点和艺术观点的盲目的全盘吸收。我们不认为这些技巧同革命现实主义是对立的，相反，它们丰富了革命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增强了革命现实主义的表现能力。我们也无意独尊这一种风格、式样的小说。在这本选集里，不但可以读到《蝴蝶》、《黑骏马》和《南方的岸》这类小说，还可以欣赏“田园抒情诗”式的《蒲柳人家》，听到《立体交叉桥》里老舍式的京腔儿，嗅到《驼峰上的爱》中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其中大部分作品基本上采用的是传统的革命现实主义手法，但都有所发展变化，也就是说，它不排斥并吸收其他一些健康的有益的创作方法，为作品融进了当今时代特有的气氛、情调和节奏。

读完这本选集，您就会不难想象中篇文坛上风格广泛多样的百花争艳的情景。我们深信，今后随着城乡改革事业的深入发展，经济建设的腾飞，社会（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革，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也必将同步前进，创新，发展，更加绚丽多彩、气象万千，取得更加灿烂辉煌的成果。